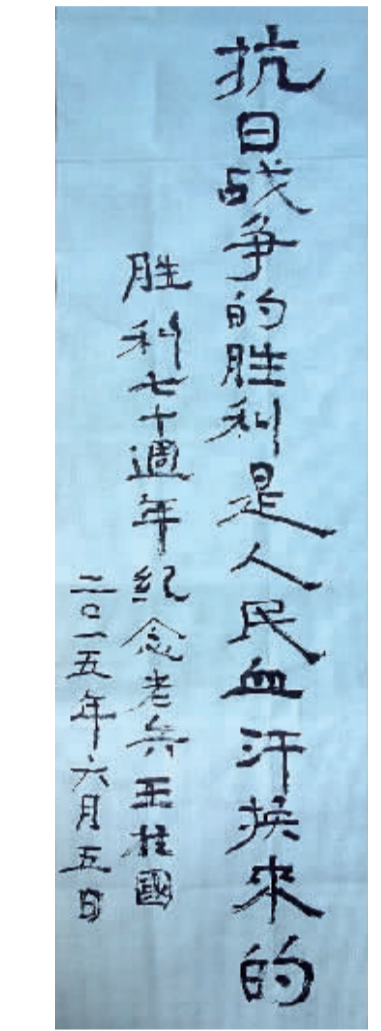




王柱国近照。 魏永刚摄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血汗换来的”。  
王柱国2015年6月5日书

# “怕当亡国奴啊！”

——访本报离休干部、八路军老战士王柱国

□ 魏永刚 王文军

据地和游击区。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平津保三角区”，就是今天的北京、天津、保定地区。日本要稳住这个地方好进一步侵略华北；八路军则努力争夺这个地方，牵制日军的力量。所以，战斗十分频繁。王柱国所在部队属于八路军115师，他们在这里进行的就是平原游击战。

“夜里行军，白天打仗”，这就是那些年的生活。

有一个时期，八路军夜晚行军到哪个村，日本人很快就会知道。后来，才发现是因为灯笼的缘故。平原上的村子，都在高处挂着一盏灯笼。八路军到了哪个村，村里的日伪军特务就把灯笼放下来，这等于是给日本鬼子通风报信。敌后武工队的小伙子很快就想出了好办法。他们悄悄地找到村里伪保长的家，然后跳墙进去，控制保长之后，我们的队伍就住到保长家的院子里。这样，保长如果给日本鬼子报信，鬼子会发现八路军却住在他家，这等于告诉鬼子“保长通敌”，那保长能有什么好结果呢！

听老人讲抗战的故事，充满了传奇。但在老人的记忆中，战争的困难要比故事的传奇更难忘。王柱国老人曾经担任过机炮连连长，“机”就是重机枪，“炮”就是迫击炮。这个“机炮连”的装备是多少呢？老人告诉我们，只有一门迫击炮、两挺重机枪。他还记得，迫击炮有50斤、底座30斤，加起来就是80斤，每挺重机枪也有60多斤。这对于打游击的八路军来说，是不少的分量。“这可是我们的宝贝啊，每次行军都要七匹马来驮。”王柱国老人说，那时候他们最怕马受伤，保护马比保护人还要紧。

迫击炮和重机枪已经是当时的“豪华武器”了。八路军在游击战争中，每一颗子弹都要省着用。当时，有一个通行的“规则”，敌人到30米近的时候才可以开枪。为什么这样呢？王柱国老人说，这不是规定，但大家确实是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省子弹。因为到了30米左右的时候，开枪基本可以打准，不会浪费子弹。

王柱国老人还记得当年指挥“北岸村伏击战”的情景。当时，敌人在一个叫赵庄的地方设立了据点。八路军游击队佯攻赵庄，日军的援兵便出动支援赵庄。王柱国带着一个连，在日军必经的一个叫北南村的地方伏击敌人。“这次打了个胜仗，还打死了日军的指挥官村上康次。”老人说他是从缴获的日本军官日记上，记住这个名字的。现在，他还记得那个日本指挥官的样子：“他挎着望远镜，穿的衣服很好，还带了一把好手枪。”

这次战斗的收获是缴获了4箱子三八大盖枪的子弹，还有两箱掷弹筒的炮弹。当时，游击队和八路军的兵工厂可以造地雷和手榴弹，但子弹还造不出来。这些战利品是一个大收获。听着这个故事，不由得想起了那句歌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七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起战争，老人记忆更深的是老百姓对八路军的支持。当时的平原游击队就住在老百姓家里。他说，“老百姓都是咱的人，我们每顿吃饭都按规定给老百姓付钱，但有的人坚持不要钱。游击行军走到哪个村需要住下来，老百姓都会主动腾房子，把最好的房子留给八路军住。”

王柱国老人的家人告诉我们，有时候老人会记起自己的战友，想打个电话。但家里人都不敢和他的战友们联系了，谁知道还有几个人在世呢？这样的次数多了，老人也就不再要求给战友打电话，只是断不了还会念叨那些战友。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前夕，听老人讲述抗战的故事，我们不由得称赞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功臣。老人连忙说：“可不敢叫‘功臣’，我自己就是做了一点事，做了一点自己能做的事，真算不上功臣。”

报社负责老干部工作的同志曾经征求王柱国老人对老干部工作的意见，说“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老人说：“现在是和平年代，生活很好，还能有什么要求呢？我要是再提要求，可就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了！”



里那把真家伙的嘎子，却一溜烟儿钻出人群，爬上高高的树杈。成熟了一些的嘎子恋恋不舍地将枪上交，却被队长批准发给他使用，兴高采烈的嘎子把曾经心爱的木头枪送给了胖墩……

电影在小孩子们咯咯的笑声中落下了帷幕，调皮勇敢、鲁莽正直的嘎子形象却深深地留在了那里。这样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角色激励了千千万万个少年儿童，不服输、不怕苦的英勇品质深植在了他们心中。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 阳光下的罪恶

□ 倪伟龄

图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遗址。  
黄力辉摄

走进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被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氛包围——肮脏的细菌弹壳！注射人体的毒剂！锯断肢体的铁锯！残害国人的军刀、机枪、手榴弹！灭证后的残垣断壁！实验遗弃的尸骨！刽子手们邪恶的面孔！数以千计的罹难名单！更令人发指的是那些历史照片和模拟雕塑——活人冻伤、耐热、断水、电击、倒控、截肢等数十种实验！活体抽取人体内脏！染毒黄鼠传播病毒！那骇人的焚尸间里，不但焚烧细菌试验后的残尸，还有鲜活的生命！

斑斑罪证罄竹难书。这座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里，汇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用愤怒、良知对侵华日军血腥罪行的控诉，记者和每位参观者一样，感受到心灵的震撼，仿佛目睹到杀人部队的狰狞面目。

活体实验

据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工作人员介绍，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为实现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政治野心，公然违背国际法，秘密策划了生物战，化学战的战争阴谋，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这些化学武器用于战场，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凶残的法西斯战争罪人。盘踞在哈尔滨市平房区达13年之久的满洲第731部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实施这一阴谋的中枢机构。他们在这里不仅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和生产，而且惨无人道地利用健康人做细菌实验和毒气实验。据原队员供述：仅在1939年至1945年，就残杀3000人以上。

魔鬼勾当

731部队的创办者石井四郎是医学博士。拥有天职的职业，却做着魔鬼的勾当。石井四郎反复到陆军参谋本部游说，用细菌战弥补日军在侵略战争中的资源不足问题。他估计说：“细菌武器杀伤力大、传染性强、死亡率高，而投资又少，节省钢铁，是一种很有力的进攻武器。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在日本当局支持下，1932年8月，日本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创立了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在石井四郎的主持下，大批研究人员开始从事霍乱、伤寒、炭疽等各种传染病菌的研究。“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准备把细菌实验基地转移到中国东北。目的是在临近苏联边境的地方建立细菌战根据地，以供将来进犯苏联之用。1933年8月，日军在哈尔滨市秘密设立了石井部队，石井四郎任部部长。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开始了细菌战的研究、生产和人体实验。1941年该部队启用“满洲第731部队”番号。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731部队败逃之际炸毁了大部分建筑，形成了现在遗址的整体格局。

“特别移送”

被731部队残害的人都是“特别移送”而来。在关东军司令与731部队队长石井四郎等人的秘密策划下，日本宪兵队给被押送人员规定了一个专用名词“特别移送”。被认定为重犯的人，无须提交法庭审判，可秘密押送到731部队，供细菌实验之用。被押送的人大多数是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苏联红军官兵以及反满抗日的地下工作者等。各日军宪兵队甚至把无辜平民、流浪少年也随便抓来。历史档案中共发现“特别移送”人员1203人。

牢记历史

如今，731陈列馆已被确定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及制造基地。这里举办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展”和“阳光下的罪恶——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证展”每年接待参观人数40万人左右，是爱国主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开展和平教育、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被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揭露731部队的丑恶历史，就是要用事实警示后人，让历史呼唤人类的和平、文明与进步，不再让历史悲剧重演。

## 人小鬼大真英雄

□ 李哲

“举起手来”，一个歪戴破草帽的“野小子”手拿木头枪顶在汉奸的腰眼上，只这一个画面，小兵张嘎的名字就会立刻出现在许多人的脑海里。

身穿白褂，光着脚丫，擅游泳，能爬树，爱咬人，机灵鬼透，野气逼人……是的，这就是陪伴了多少人的童年，自己却永远长不大的电影角色嘎子。《小兵张嘎》自1961年发表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张嘎”，因其“英气”与“嘎气”，已成为新中国几代人童年记忆中最灿烂的一部分。

在河北白洋淀，美丽的湖光山色和丑陋的炮楼、天真的孩童和凶残的日本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影片一开场，枪声和伤员所制造的紧张气氛就揪住了观众的心。

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老钟叔”，硬骨头的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下，而老钟叔也被敌人抓走。目睹了这一切，并失去了唯一亲人的嘎子只身一人去寻找八路军队伍。他却中途误把心目中的八路军英雄罗金宝当成了汉奸，还使出了用木头枪挟持他的鬼点子。阴差阳错之下，嘎子成功地找到了队伍，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

虽然当上了八路，嘎子却还是那个13岁的野小子。在缴了王翻译的枪后，嘎子成为了孩子堆里的大英雄，这下他的尾巴翘到了天上，连希特勒的名字都念不准的他竟然有模有样地给孩子们作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报告，场面让人忍俊不禁。

更可笑的是，怕打赌输掉木头枪，嘎子在和胖墩摔跤的过程中不仅使出了咬人的要赖招数，失落之余还堵了胖墩家的烟囱，一个调皮捣蛋的嘎小子形象跃然银幕之上。

就是这样一个惹人心疼惹人爱的嘎小子却被抓进了日本碉楼，观众的心再次被揪紧。

湖面是战场，芦苇成为了最好的屏障，而小渔船则化身成四匹战马。八路军的部队在白洋淀特殊的地理条件下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争。钟连长与嘎子都被成功营救，而白洋淀一带的最后一个鬼子窝也被彻底端掉。日光斑驳中“莲叶何田田”的美丽景致又恢复了应有的欢声笑语。

而此时，始终惦念着自己藏在老鸦窝

## 宝塔山下斗志坚

□ 姜天骄

千万革命者向往延安、热爱延安的强烈愿望和真挚感情。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着华北大地，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937年10月，郑律成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后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教员。当时，通过自己创作的艺术形式反映现实斗争，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是许多进步作家、艺术家的心愿。

1938年的一个傍晚，在延安城北的山坡上，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正在那里眺望着刚从群众大会上走出来的人群。看，那英姿勃勃、步伐整齐的是抗大的队伍；听，那此起彼伏、响彻全城的是抗战的歌声。革命圣地欣欣向荣的动人景象，激发了郑律成的创作灵感，也打动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女诗人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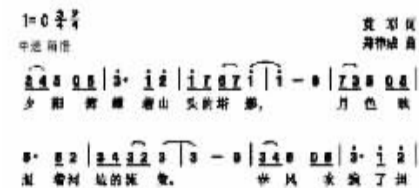
耶。两人一拍即合，一首革命圣地的歌曲——《延安颂》诞生了。

歌曲开始时，优美的旋律，妩媚中蕴含着豪迈的激情。“塔影”、“河边”、“原野”、“群山”，这些对特定环境和风光的描绘，都令人心驰神往。中段转入铿锵有力的进行曲风格，使歌曲加强了坚定性和动力性，一种不可遏止的战斗激情油然而生。最后，歌曲情绪达到高潮，仿佛把人民群众带到了歌声四起的宝塔山下，颂赞式的音调表达了人民抗日的坚强斗志以及对延安革命圣地的热爱和崇拜。

这首抒发革命豪情的歌曲，是莫耶与郑律成献给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曲心灵之歌。他们倾诉着革命青年的心声，鼓舞着前方战士的杀敌斗志。这首壮丽的颂歌，成为延安时代的象征。

抗战八年，虽然这首歌没有正式出

延安颂



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者的心目中，有一个梦里都会向往的地方——延安。

延安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进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是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指挥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里住了13年之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孕育和形成了宝贵的延安精神，也涌现出一大批歌颂延安、赞美延安的文艺作品，歌曲《延安颂》就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这首由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的歌曲唱出了延安的圣洁、美好，也唱出了

